

史记

之魂

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

SHIJI ZHI HUN

【上册】



王嗣敏◎著

秉古烁今，不虚美不隐恶，不挟私不苟同，不惜命不爱财，不愧不怍不屈不挠，不见风使舵，不怨天不尤人，忍辱苦斗，实事求是，质近孔孟老庄墨翟学，开正史之首，公真做到千秋不朽，克成大德昭日月

呕心沥血，有继承有总结有创造有肝胆有理想有卓见，有智有信有仁有勇，有以身殉道，有家学有自励，发奋著书，兼收并蓄，文追屈贾扬班相如赋，酬两代之劳，我愧未睹先哲风范，光大遗著慰英灵

华夏出版社

王嗣敏◎著

史记

SHIJI ZHI HUI



——【上册】——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记之魂/王嗣敏著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8.6

ISBN 978-7-5080-4776-8

I. 史… II. 王… III. 史记-研究 IV. K20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0255 号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装订

787×1092 1/16 开本 51.25 印张 892 千字 插页 2

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75.00 元

(全二册)

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前 言

一部《史记》，宽厚宏博，志意慷慨，洋洋洒洒五十余万言，记述了我们中华民族在神采飞扬的时代个性张扬的英雄，它是当之无愧的百科全书，同时也是研究中国思想、历史和文化的入门书。中国人的思想基本形成于先秦时代，比如影响最深的儒家、道家、法家等都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。而要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和文化，必须要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和社会。没有对这一时期恢宏雄大的社会变革有入木三分的认识，是很难深刻理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的。而要研究好这一时期的历史和社会，显然是需要先把《史记》研究明白的。

我们常说《史记》是一部通史，时间跨度有两千多年，它包括四个时期：神话传说及夏商西周时代、春秋时代、战国时代和秦汉时代，涵盖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，也就是司马迁所处的时代，对于他来说，既有古代史，也有现代史。

一般来说，在中国典籍中，《尚书》比较侧重于神话传说及夏商西周这段历史，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侧重于东周开始到孔子之前的历史，《战国策》一类的侧重于孔子之后战国七雄到秦始皇统一这段历史，而秦汉之际到汉武帝这段时期的历史基本是由《史记》记述的。《尚书》过于简洁，语言也较为晦涩，《左传》虽然留下了大量的成语，文字优美，但是属于断代史，加上国家众多，很难理清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，《战国策》是以国别体纪事的，也是很难理清头绪，《史记》则不然，既以时间为主轴，又采用国别及人物的终始为线索，而且又对先秦的语言进行创造性的革新，更加“白话”一些，语言更加优美，历史事件及人物命运交代得更加清晰，加上他独有的史才、史识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，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著书立说的奋斗意志，使《史记》成为一部奇书，万古流芳。

我们中国是以历史典籍闻名于世的，《史记》树立了中国史书的典范，即以人物传记为记叙方式，分成本纪、列传等形式，兼容天文（北斗七星、二十八宿、金星、木星、土星、彗星、日食、月食、牵牛织女等在《史记》中都有记载，中国要是早与西方沟通，发现的哈雷彗星就不会是哈雷了）、历法、地理等科学知识，一直延续了两千年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《史记》中的散文纵横恣肆，气魄宏伟，对后世

影响极深,唐代文学领袖韩愈、柳宗元提倡的“复古运动”,也就是提倡先秦两汉散文的写法,以此压倒流行已久但是内容空洞的骈文。《史记》无疑是两汉散文的杰出代表,古文学家对《史记》推崇备至,烂熟于胸,柳宗元的文章就比较关注社会底层人物,无疑是对《史记》笔法的延续。《汉书》中关于初汉人物的描写,基本是按照《史记》的原文。《三国志》中应用了大量《史记》中的人物和事件,用来借古讽今。比如诸葛亮自比管仲、乐毅,曹操自比周公、齐桓公、晋文公,袁绍也学周公,只不过学的是皮毛,曹操称荀彧是自己的张良,称徐晃有周亚夫之风,为什么这么比?说孙权有“勾践之奇”,说刘备有“高祖之风”,为什么这么说?要想理解其内涵,一定要知道那些人的功绩和特点。

当然,实事求是地说,《史记》中关于春秋、战国时期中的记载不是司马迁独创的,他不是凭空编小说,他必须参考古代历史典籍,里面有些是《左传》的内容,但是在交代人物关系、事件始末和进行文学性再创作方面,司马迁的工作成果是有目共睹的。《史记》对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,最为明显的就是《聊斋志异》,不管是对人物的刻画和句式的用法,都是深受司马迁的影响,一般使用短句,三五个字,既短促有力,又做到形象刻画,最后又有一个“异史氏曰”,和《史记》的“太史公曰”完全相同,阐发一家之言。郭沫若创作的戏剧《棠棣之花》、《虎符》、《屈原》以及当代林兆华的《刺客》都是对脍炙人口的《史记》故事的发挥和改编,要想真正说清《史记》对中国社会的影响,够出本专著了,在此不作赘述。

但是这样伟大的著作为什么一直属于阳春白雪式的高雅文化?人们只能对这里的人物及故事做支离破碎的理解?很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出现像《三国志》的普及版——《三国演义》那样的著作。要是说有,也就是《东周列国志》罢了,但是它真能担当这样的任务吗?恐怕未必。蔡元放和冯梦龙创作这本书无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,这是毋庸置疑的,谁要是否定这一点,谁就是一个狂妄无知的人,能把千年的历史用演义小说的形式写出来,相当不易,这人无疑是大家。有可能这本书没有《三国演义》那样的好运气,能在百八十年中汇集了那么多奇人奇事,让人读后感慨万千、荡气回肠,所以它的流传广度不如《三国演义》。笔者曾经在读完《史记》后,试图读完《东周列国志》,遗憾的是,努力两次都半途而废,按照我的个性,一直是以攻克大部头书籍为荣的,这次真有点甘于失败。当然每个人的欣赏眼光不同,我确实感觉此书内容庞杂,语言的精美度也一般,当然,作者也有没办法的地方,时间跨度确实太大,而且史实材料千头万绪,不交代清楚,让人云里雾里,不知所云,要想交代清楚,只能面面俱到,取舍很难,而且这段历史风云变幻,国家林林总总,兴衰变化,让人目不暇接,人物、官职、古地名好像走马灯一

样,想要梳理清楚,确实不易,不像《三国演义》时间跨度短,事件集中,加上罗贯中的天才性创作,读起来还是容易得多。有一点需要指明的是,《史记》中的故事同样精彩,比起《三国志》丝毫不逊色,只是想要把历史事件、成语典故说得一清二楚不容易,所以在普及性上逊色于三国史罢了。毛主席说:“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,是说学得彻底、用得纯熟不容易。”确实想要把《史记》研究清楚不容易,想要写出它的普及本尤其是难上加难。可以说,笔者想要把《史记》真正普及起来的想法由来已久。

后来,笔者研究《史记》略有点小名气,很多人问我有没有比较好的普及本,因为他们都不是想专门研究《史记》的,只是想吸取其精华,为己所用,不用说能不能忍受那种寂寞,要想看懂《史记》原文,还是需要对文言文知识、历史文化及典章制度等方面有一定积累的,我没有向他们推荐《东周列国志》,因为我怕他们因为读它,反而对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产生偏见,以为不过如此,因为我们经常犯以偏概全的毛病。我就向他们推荐《白话史记》或者其他关于《史记》的学术著作,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,后来,我也知道了这里面的原因,比如说,他们看这类题材的学术著作——关于《史记》的美学赏析,如果说他们连人物关系、历史事件的演变和人物所处的时代及社会背景都没有基本的了解,就是说没有基础性的了解,又怎能理解其精神实质,又怎能理解那种美呢?没有学会走又怎么能跑呢?所以这样的书只能在业界流行,即使是最为震撼的研究成果,对普通的读者也影响不大,或者接近于零。我曾经向年轻人推荐《红楼梦》,他们的很大困惑就是搞不清人物关系,比如搞不清贾宝玉、贾探春和贾环的关系,就不会理解赵姨娘知道探春给宝玉做鞋为什么会吃醋了,当然他们这种知难而退的态度是极其错误的,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会一事无成的,一遍搞不懂,多看几遍,自己动手画人物关系表,不就行了吗?但是每个人的志趣秉性不同,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红学家,都要把红楼梦研究得滚瓜烂熟,要是能有一个简洁明了的四大家族关系表,对于非红学专业的普通读者,就会很好了,这都是从普及的角度考虑的,不是说专业研究,当然即使是对于专业人士,要是通俗易懂的研究指南,也是一件美事吧。如果说,普通读者对《红楼梦》的人际关系头疼,那么对于《史记》更是望而生畏了吧。

对于怎样写好《史记》普及本,笔者颇费了一番脑筋,俗话说:“画鬼容易,画人难。”因为鬼谁也没有看到,我画一个就说是鬼,你说不是,可是你也找不到参照物,也无法反驳我,但是画人则不然,像不像一目了然,而且这里面还有人的主观因素在里面,甚至每个人都有一个标准。我没有办法,就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,进行了一次再创作,我的书肯定没有最新的学术成果,因为我根本没有什么

学术素养,如果要是算个“家”的话,那就是“百姓家”,没有显赫的师承渊源,就是天生喜欢,于是就闭门造车起来。只是现在的时代好,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于是我也就有了一点机会。就这样我写了这本书,不是《白话史记》,不是学术著作,不是小说,不是散文,是“四不像”,只有一个目的,就是只要能够让普通人读懂《史记》,只要能够体现出《史记》的精髓,只要真能起到普及的作用,我就达到目的了。

我对司马迁充满景仰之情,他是我的精神领袖之一,他的《报任安书》我读了不下一百遍,每次读都让我很感动,也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。这种人格上的尊重是一回事,怎样在新时代再现历史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不可能对司马迁亦步亦趋,完全框死在他的价值观体系下,因为我们不是同时代人,甚至说价值观天翻地覆,但是我必须要尊重司马迁的观点,要把他的观点表述清楚。因为人不能逃离自己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,有些观点我们必须设身处地,站在司马迁的基点上考虑问题,同时,我们又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基点上,就是说,我们作为两千年之后的人,时代赋予了我们更多的思考点,我们理应站得更高,看得更远,吸取更多的智慧为现实服务。做到借古讽今、借古喻今、古为今用,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,也是更有意义的。从这个角度说,我其实是在写自己的《史记》。

毛主席说:“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的话,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,起着领导的、决定的作用,其他则是处于次要和服从的矛盾……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……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,不懂得这种方法,结果如堕烟海,找不到中心,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。”(见《矛盾论》)这话让人警醒和沉思。那么按照我的这种创作思路,我的主要矛盾在哪里呢?就是我要做的中心工作是什么呢?我的中心工作就是怎样写出能让普通人看懂的《史记》。我设定的读者群是没有时间研读原著,同时又想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,来为自己服务,同时能够增加一定的文学素养,了解一点自己没有搞清的成语典故等的人。这就要求我要尽量使用通俗的语言。

由于目的不同,角度不同,研究者不同,也决定了我们对《史记》理解的多样性。笔者研究《史记》的角度和别人的有点不同,我们也应该尊重这种不同,只要我不胡言乱语,流毒社会,如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家之言,我想是会有它的生存空间的。虽然我是想用尽量通俗的语言来写,但是我又不能用通俗小说的标准来讲解《史记》,在情节上大力渲染,要知道《史记》中的对话和谋划才是最精华的部分,我必须要把这部分体现出来,不但没有删节,而且为了把意思说清楚,反而又增加了一些内容,这是拙作的特点之一。我读书,不但要知其然,还要知其所以然,就是愿意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,愿意探寻深层的原因,我本来可以用更加

清新优美的语言来写,也可以多设置点悬念,引人入胜,但是这种写法不能四处套用,《史记》就是因为人物庞杂才难懂,如果再设置各种悬念,怕是更让人如堕烟海,不辨东西,所以我以为对于《史记》来说,最好的是从根谈起,用根根细线把散落的珍珠串起来。我也可以删去大量的对话,或者只用几句话表达出意思即可,而自己纵论《史记》中的人物,没问题,这样好写得多,但是我又感觉这样就把《史记》的最精华部分给忽略了,所以考虑再三,也尝试了别种写法,最后我还是认可现在的表述方式。

既然我的目的是为了创作普及版的《史记》,形式又想尽量通俗,但是我又不能彻底地通俗化,不能简单地徘徊在情节上,就是说不能用通俗小说的写法来普及《史记》,因为《史记》之所以名垂青史,不仅仅是靠情节离奇就可做到的,其思想性和文学性才是重中之重。这部书承载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,如果不把其精神实质体现出来,那么这部书的真正价值不会体现,这样就侮辱了司马迁,也埋没了这部名著。笔者有个小小的理想,就是能够让《史记》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,可能要想达到三国史那样妇孺皆知,有困难,但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真正理解它,这是笔者的心愿。也可能是笔者杞人忧天,普通百姓不敢说,一般读过书的好像都知道《史记》的伟大之处,但是问他这部书究竟对他有什么意义,好像又回答不上来。知道了并不等于理解了,理解了并不等于会用了,学以致用是我们学习的最终目的。读史可以明智,通过读史而提高了自己认识与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与能力,这是读史的最高境界,当然,也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。

我的书也不是探秘,笔者更加关注内容和文本本身,关注其博大精深的内涵,就是说,把《史记》当做最为杰出的语文课本来学习,要比咬文嚼字、探幽揭秘对普通读者更有意义。我也没有只是简单地记述人物的人生轨迹,如果是这样的话,创作起来还是要容易得多,关注本质,关注与现实的联系,关注精神实质,关注对人的鼓舞和启迪,关注战略、人性和人物性格及命运,以及关注观察人考察人做事情的方法,这是笔者创作的重中之重,由此产生笔者的战略战术,怎么体现这些东西呢?由于这些东西在现实中才是最重要的,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,我是在重新创作。

如果大家读过原著的话,就会知道,除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及历史事实和背景之外,这七八十万字,基本都是笔者自己的语言,尽管这样意译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,甚至是会被人所诟病,但是为了服务于我的创作目的和要解决的主要矛盾,我在所不惜,因为内容和目的决定形式,我就是要让人读懂,达不到“信、达、雅”的最高境界也没问题,这种严格的翻译标准不适合拙作的创作目的。在创作中,我融合了《古文观止》、《战国策》的相关内容,又把唐诗宋词等文化点

与《史记》中的典故做了简单的联系,以历史人物为经,以成语典故为纬。这样,在学习别的知识时,就会知道其历史渊源,这是我的目的,只要达到这点就成功了。我要抓的主要矛盾,就是创作让人读懂、能够系统地进行普及的版本,我只能抓住这个主要矛盾,对其他的矛盾,我只能兼顾,兼顾不了只能舍弃。

那我们在读《史记》时,应该把关注点放在哪里呢?放在战略、人性、智慧和内涵上。司马迁的创作是不是没有缺点呢?肯定会有。这部书在《汉书》中被评价为“信史”,就是说史实比较可靠。司马迁一直博览群书,又游遍祖国名山大川,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,做到了理论和实践、知和行的统一。笔者读《史记》时知道,他曾经实地考察过自己创作的人物的家乡,考察当地的社会风俗,比如他去过韩信的家乡、孟尝君的封地和魏国的都城大梁,大梁就是现在的开封一带,知道《魏公子列传》中所说的“夷门”就是指大梁的东门,这件事虽小,但正是对这种细节的精益求精,才成就了这部伟大的名著。他又考察了大禹治水时的足迹等等,都说明了他具有重视科学考察的精神。在被处以宫刑之后,因为其学识渊博,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,本来这个职位一直是由宦官担任的,这段时期是司马迁最感耻辱的时候,可是为了自己的理想,只好忍辱奋斗,这时的便利条件是他可以查看国家档案馆里的资料,这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,为他成为大博学家创造了条件,也是他能开千古文章之滥觞的重要原因。还有就是其家学渊源,其父司马谈也为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,而且让他十岁时就开始钻研古书,父亲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,《史记》汇聚了两代人几十年的心血,曹雪芹说自己创作《红楼梦》是“字字看来皆是血,十年辛苦不寻常”,他们俩应该是知音。

遭受宫刑,又给了他独特的气质,使整部《史记》蒙上了一种感伤,司马迁笔下的人物许多都是悲剧人物,而悲剧是最容易感染人的,这种独特的创作情感,使人备受感染,但是奇怪的是,即使这样,也没有改变他的辩证的思考方式,他还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,这是其伟大之处。可是有些吹毛求疵之辈,说司马迁因为好奇,夸张了故事情节和心理描写,确实,司马迁不应该知道很多人的所思所想,比如项羽所作的《霸王别姬》就值得怀疑,在那么紧张的军事斗争环境中怎么还有这种闲情雅致。但是我们不要在这方面死心眼,我们要看这种描写符不符合人物身份和人物性格,就是说这样的描写符不符合这人的行事原则,符不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和精神面貌,也就是说符不符合人性,只要能够符合人物特征,我们就不要咬文嚼字,你可以怀疑司马迁对人物心理的描写,但是你也拿不出证据证明那人当时就不是那样想的,纠缠在这些问题上毫无意义。《红楼梦》上的事也不会都是真的,可是有人说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横断面,是时代人物的缩

影,因为那时的人就应该这样想,至于具体内容可以有争议,但是思维方式是符合的。历史是人心路历程的记录,只有这些活生生的人,才可以给我们的心灵以震撼,也让我们思索。《史记》是“战略学”和“人性学”的光辉典范。不能因噎废食,不能以偏概全,不能吹毛求疵,看《史记》要抓大义。

我再略微交代一下我对《史记》的取舍和重新编排。如果大家想研究一下司马迁的思想,最好是读一下《太史公自序》和《报任安书》,这两篇文章记述了司马迁的创作思路和发愤著书的原因,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中的内容主要就是这两篇文章。他创作了八书、十表、十二本纪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,开“二十五史”之典范。八书是对上古到汉初的天文、历法、地理、经济及典章制度的总结性著作,也就是司马迁的学术论文,因为这是中国科技史的内容,超出我能力的范围,同时也不是我研究的重点,因此割舍。十表是按照时间的顺序,把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帝王和诸侯的世系传承进行了整理,也对这两千年的历史大事进行了梳理,笔者对十表另有安排。笔者的重点还是放在本纪、世家和列传上,因为这是写人的,是笔者最感兴趣的,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,但是笔者根据现代人的阅读习惯进行了整理、取舍,进行了重新编排,就是说这样更直观更好懂。

那我是怎么思考的呢?十二本纪是为帝王或掌握当时国运的人物作传,包括《五帝本纪第一》、《夏本纪第二》、《殷本纪第三》、《周本纪第四》、《秦本纪第五》、《秦始皇本纪第六》、《项羽本纪第七》、《高祖本纪第八》、《吕后本纪第九》、《孝文本纪第十》、《孝景本纪第十一》、《孝武本纪第十二》,十二本纪排在《史记》的最前面,也是算作从黄帝到汉武帝的简史,但是问题是,现在的读者特别是对历史不太熟悉的可能看起来就比较费劲,因为还有许多的故事发生在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中,先看本纪有的未必能看懂,等看后面的时候,可能又忘了前面的,如果不知道前因后果,就很难理解人物。一般来说读第一遍只能得到笼统的印象,要想把一切梳理明白,可能确实要读个几遍,可是五十多万字的文言文,除了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,又有几个能耐住寂寞通读几遍呢?特别是对于年轻人,但是懂点《史记》对年轻人还是有点用的,这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之一,里面出了大量的历史典故和成语妙语。《史记》相对来说还是简单的,司马迁把中国语言进行了创新,它比前代典籍更加白话,只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说,它还是晦涩难懂,对两者之间的比较大家可以参看由北京出版社推出的“大家小书”系列、《中国文学史》创作者之一季镇淮先生的《司马迁》,里面进行了比较(唐朝的历史学家刘知几把中国历史学分为六家:一为《尚书》家,二为《春秋》家,三为《左传》家,四为《国语》家,五为《史记》家,六为《汉书》家。季先生认为这是降低了《史记》的地位,《史记》的地位是出类拔萃的,大家可以参看他的著作)。也可能是笔者交往

范围狭小,痴长几十年,只遇到一个叫徐圣贤的朝鲜族朋友钻研《资治通鉴》,颇有心得。这样好的著作不能真正普及,深为遗憾。

司马迁的重点也是放在孔子之后,笔者也认为很对,因为五帝、夏商西周的历史较远,而且里面描写人物性格的东西不多,有对统治者治国得失的讽谏,而我的创作目标是放在普通读者身上,统治者也不会看我写的这种书,我只用一章《源远流长》把本纪中的前四个部分做了简要的介绍。在《大秦风云》中,我把《史记》原文中的《秦本纪第五》、《秦始皇本纪第六》、《商鞅列传第八》、《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》、《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》写在了一起,秦国的君主,主要是秦襄公、秦穆公、秦孝公、秦昭王、秦庄襄王、秦始皇、秦二世。秦襄公时是秦国正式成为诸侯的开始;秦穆公时代的大臣主要是百里奚和蹇叔,这两个人基本上奠定了秦人发展的基础;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是秦国能够强大起来的重要因素,所以应该把商鞅加入到这里,否则很难理解秦人的成功;秦昭王是秦始皇的曾祖父,他在位五十多年,在这时秦国的疆域空前广大,他任用白起为将,白起是领导“长平之战”的主帅,秦人的这次胜利基本上就预示着他们要完成统一大业了,这是影响国运的战役,所以把白起写在这里,通过白起的事迹转带秦昭王。这次大战是当时国际上的大事,之前有范雎的“反间计”,中间有赵括的“纸上谈兵”,之后有邯郸之围,这才发生“毛遂自荐”和“信陵君窃符救赵”,这些都是连锁反应。秦庄襄王是秦始皇的父亲,他本来没有机会即位,是吕不韦散尽家财帮他运作成功的,而且秦始皇登基时只有十三岁,丞相吕不韦是事实上的秦王,据说吕不韦才是秦始皇的真正父亲,所以为了情节紧张丰满,把吕不韦写入这里。秦始皇兼并六国的行动通过名将王翦的事迹来表现,其他的基本是《秦始皇本纪》的内容。秦二世里面加入“指鹿为马”的那个赵高,是他为秦王朝的灭亡煽风点火的,所以加入到里面。秦惠王时代丞相张仪、秦昭王时代丞相范雎及蔡泽、秦始皇时代丞相李斯都单独有传,没有加入到这里。我把《大秦风云》的构思详细讲来,就是说本书其他章节的安排也出于同样考虑。

因为齐桓公是“春秋五霸”之首,其事迹在当时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其后的人常拿他说事,所以我把“姜齐豪士”放在本书的第二,又因为想要区别于战国时代的“田氏齐国”,所以用“姜齐”表示,表明这是姜子牙创建的那个春秋时代的齐国。又因为管仲和晏子是春秋时代姜氏齐国的贤相,所以把《史记·管晏列传第二》放入此篇。因为吴国的始祖吴太伯和周王朝关系密切,安排在第三的位置,还能和《源远流长》的人物关系联系起来,而且吴、越两国的历史主要集中在春秋末期,这段历史在当时就给人很多教益,所以先写出来,大家在看后面的文章提到这里的人物和事件时会理解得更深刻些。笔者把《吴太伯世家第一》与《越王

勾践世家第十一》合并,把《伍子胥列传》放在第四的位置,因为他在吴越争霸中作用很大,同时又有自己的特殊命运,因此单列。本来《史记》原文中的顺序是本纪、世家和列传,为了直观,笔者把列传中的伍子胥提上来,在《孔子弟子列传第七》中孔子的弟子子贡也是这个时代的人,因为在吴、越间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暴,放在这个环境中最好,笔者不想写孔子弟子列传,若要写,又要重复吴、越这段历史,不重复就让人难懂。笔者在拙作中对许多人物都是这样处理的,同样把《刺客列传第二十六》中专诸的事迹也放在了《吴越争霸》中。

因为秦朝的历史相当悠久,通过《大秦风云》,可以对春秋、战国和秦始皇统一这段历史有个整体的认识,又因为秦穆公与春秋时代的晋国关系密切,把它放在第五的位置上,把随后的《大晋悲歌》放在第六的位置上,就比较好叙述。又因为“战国七雄”中的韩、赵、魏是“三家分晋”的结果,所以《大赵雄姿》(第七)和《大魏英魂》(第八)随其后好叙述,而《史记·韩世家第十五》因为比较简略,没有太多的思考空间,笔者就略去,而是分散在其他文章中。又因为这三家中赵国与晋国的政治关系最密切,所以《大赵雄姿》放在《大晋悲歌》的后面,重复的情节可以详略得当,互相参考,既密切了联系,又不显累赘,这也是司马迁创造的“互见法”,笔者只是重新使用这个方法罢了。笔者在本书的很多地方都使用了这种方法,请大家注意。又因为《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》中的人物是战国时代赵国的杰出人物,影响国运,而且与“长平之战”关系密切,就并入《大赵雄姿》,也可以与《大秦风云》相照应。在《战国策》中有《赵威后问齐使》,《史记》上没有记载,但这是一篇好文章,而且收录在《古文观止》中,我这样写是为了大家研究《古文观止》时也方便些,我在创作中,把能想到的关于《史记》与后来文学作品的联结点做了必要的介绍,一方面提醒大家注意《史记》的博大精深以及与中国文化的联系,另一方面对大家的其他研究略有帮助也说不定。拙作中有很多这种情况。

《田齐俊杰》就是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》的翻版,里面加上了《司马穰苴列传第四》,把它放在第九的位置是因为和随后排在第十位置的《针锋相对》密切相关。《针锋相对》中包括《史记》中的《燕召公世家第四》、《乐毅列传第二十》和《田单列传第二十二》,“燕世家”比较简略,最主要的是在战国时代发生的“子之之乱”、“燕昭王励精图治”和后期的燕太子丹请求荆轲刺秦王事件,而燕昭王就是在“子之之乱”后上台的,乐毅就是被燕昭王重用的,而田氏齐国的齐湣王就是在“子之之乱”中攻击燕国的,田单是在抵御乐毅的燕国军队中崛起的名将,这样前后因果的关系就比较明了,通过燕国内乱就把子之、燕昭王、乐毅、田单、齐湣王联系起来。如果按照《史记》原文来安排,就会有许多的重复,如果不介绍清楚,普通读者理解起来就会相对困难。《大楚古风》实际是对“春秋五霸”的总结,

偏重春秋中期的楚庄王。《史记·楚世家第十》中的主要内容,偏重在春秋末期的楚平王、楚昭王时代,这里面有与伍子胥和吴国的恩怨,在《吴越争霸》和《伍子胥传》中有详叙,还偏重在战国中后期的楚怀王时代,其事与张仪密切联系,因此放在《辩士纵横》中叙述。楚国末期的事放在《春申君传》中介绍,因此把它放在第十一。这些文章的篇幅占了拙作的一半左右。

在《史记》中,“世家”有三十篇,前十六篇是春秋、战国时代的诸侯,第十七是孔子,第十八是陈胜,后十二篇是汉初人物。如果我们按照《史记》原文的顺序讲述,就会在读完“世家”后,转入“列传”,而列传的七十篇中,前二十八个人物又是春秋战国时的人物,左右了诸侯国的政治,我们读起来有可能忘掉了前面提到的历史背景。这对于古代的私塾教育中的读书人可能没问题,可是对于成长在两千年后的白话文环境中的我们,又是一个挑战,要是不谈前面的,后面的看不懂,而且不知道前面的历史背景,读起列传来,就未必理解这人为何这样行事,因此笔者做了大量的调整。

排在十二的《辩士纵横》是《史记》中《苏秦列传第九》和《张仪列传第十》的合传,因为我们在前十一篇文章中交代了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恢宏的历史背景,又因为两人是纵横家的代表,通过两人再把战国初期国际的争斗串联起来,形成历史横断面,这样大家又会有个综合性的了解。《兵家奇谋》是对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的改编,笔者重点对《孙子兵法》进行了一点解析,这是通过兵家让我们了解春秋战国时代斗争的残酷和频繁。《诸子百家》是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的简单总结,因为这些思想家都有专著,笔者只是略有研究,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,不敢班门弄斧以致误人子弟,只是简单说些一家之言罢了,大家还是看看相关的专著。相对来说对韩非子的介绍基本与《史记》原文差不多。这三篇文章算是总结性的。

同样,因为有了前面详尽的介绍,《孟尝君传》、《平原君传》、《信陵君传》、《春申君传》、《刺客列传》就比较好理解了,只要在讲述时略微说明,大家就会融会贯通。《远交近攻》和《李斯列传》是《史记》中《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》、《李斯列传第二十七》的改编,我本来是想把这两篇放在《大秦风云》的后面,因为都是秦国的人物,这样比较完整,但是后来考虑把这两个人物放在这里比较合适,因为马上要接入楚汉战争,通过他们两人把秦朝的历史再接起来,这样就会前后连贯,特别是“李斯传”,更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,他的人生轨迹的抛物线贯穿秦始皇和秦二世,这样就为叙述下文提供了方便。

同样,笔者把《陈胜世家》也放在了一个衔接的位置上,因为他首举义旗,然后才引起了项羽、刘邦的更大规模的反抗,在《史记》原文中,《项羽本纪》和《高

《祖本纪》是排在《陈胜世家》前面的,但是我把顺序颠倒一下,这样更明白,我不是说司马迁写得明白,他是按照自创的体例和规矩创作的,无以规矩,不成方圆,只是我们现代人不容易明了罢了。本来按照正常情况,“刘邦传”之后是《吕后本纪》,但是我们不把楚汉战争介绍明白,就未必会理解吕后的许多行为,所以我让“初汉三杰”——韩信、张良、萧何紧随其后,这样就知道刘邦的成功和项羽的失败原因何在了。本来《史记》中的《留侯世家第二十五》和《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》是排在韩信前面的,讲完“世家”才是“列传”,而且“韩信传”是《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》,两者之间隔得还远,这样读起来就费劲,而且笔者在项羽传、刘邦传和韩信传中做了一点哲学的思考,也算是拙作的点睛之笔,这种思考也是对笔者观点的总结。这三篇文章用了十多万字,其篇幅占到拙作的八分之一左右,也有承前启后的作用。“张陈列传”(张耳、陈余)也算是一篇总结性文章,本来在原著中是排在列传第二十九的,笔者放在这里,是为了把刘邦和项羽集团之外的割据势力做个了结。看完《英布列传》和《彭越列传》也能让我们体味楚汉战争的艰苦,而且这两个人的身份和韩信相同,是西汉建国初的异姓诸侯王,通过这三人,可见汉初政治斗争的残酷。《酈食其传》中的酈食其是为刘邦搞外交的,有领袖、有元帅、有参谋、有丞相、有同盟者,这样我们就能对楚汉战争有个全面的了解了。

《吕后本纪》本来是排在《刘邦本纪》的后面,我把它安排在楚汉战争之后,因为吕后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在刘邦死后,所以我把她安排在这里。《孝文本纪》、《孝景本纪》和《孝武本纪》就是汉文帝、汉景帝和汉武帝的传记,笔者又把《外戚世家第十九》融合进去,这样就成了拙作中的《文治武功》。这样一直到汉武帝时代,也就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,西汉皇家的家系情况就比较清晰了,为叙述后来的人物打下基础。虽然陈平和周勃在刘邦时代就发迹了,可是他们最大的功劳是安定刘氏王朝,其事迹主要发生在吕后和汉文帝时代,所以笔者把它们安排其后,就更清晰些。袁盎传、晁错传和刘濞传主要是围绕汉景帝时期的“七国之乱”展开的,这样在时间的顺延上也形成了层次感。剩下的人物就是起到绿叶的作用,可以从另外一些侧面展现汉初的政治斗争,但已经不是决定性的人物了。

比较特殊的是《李广列传》,笔者把它放在最后,是因为李广的孙子李陵的命运和司马迁的命运紧紧相连,所以在这篇文章里笔者把《史记》中《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》全部、《匈奴列传第五十》、《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》、《大宛列传第六十三》、汉初异姓诸侯王以及“李陵传”的少部分,融合起来,加上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,把司马迁的思想情感和创作目的加入,这样也能了解他的个人命运。其他的人物传记零散分布在各个传记中,我一般选择最能体现人物命运的事件。如果单独列出,笔者以为又要和其他的内容重叠,还有个别传记舍弃不用了,因

为作为《史记》的入门书,写这些基本够了。如果大家不满足,请看原著。

笔者认为对《史记》来说,能够达到像三国史那样普及才是当务之急,争取让普通人也能在其中汲取必要的精神营养,不要单单成为精英文化。其实这段历史和三国史一样精彩,只是没有一个好的普及本。笔者就做了这种尝试,而且我把这个问题当做主要矛盾和中心问题来抓,其他的方面照顾不到只好舍弃。我的关注点就是要写出一本能够让人认识《史记》真正价值的普及本,所以这才有了“齐襄王就是让滥竽充数的东郭先生上岗的那个人”、“楚怀王就是让屈原受气的那个人”和“秦昭王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”等等的话。用一个成语或者更加耳熟能详的人物来理解生僻人物,这么说对于研究历史的是笑话,但是对于普通读者,这可能是加深他们记忆的好办法,这也算笔者的一点语言特色。有些时候,笔者为了让人理解《史记》中的人物,也用了点现代语言,用了《史记》之后的人物和事件来进行比较分析,有的难免牵强附会,或者书生意气,但是笔者力图做到谨慎,不当之处是能力不及,请大家海涵。

基本上“好为人师”这个毛病,人人都有,笔者也是人,也难免自觉不自觉地显露出来,在评论历史人物时,我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想法,没有自己的主观意见,有的观点可能不合适,但是大家只要记住这是“一家之言”,是平民布衣显现一下思古之幽情,以及对现实的一点讽喻而已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笔者并非完全是“无病呻吟”,对与不对不是我能说了算的,大家去评判吧,笔者只是提供一点思路:从个人命运及身边现实出发,用一种辩证的眼光看待历史,会发现许多被我们忽略的细节,往往这些细节会给我们更深的教益。

毛主席说,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,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,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——诚实和谦逊的态度。(见《实践论》)确实,笔者如此表述历史是不是违背了这种态度,是不是唐突了司马迁,心中惴惴不安,但是到目前为止,我还没有思索出更好的方式,抛开笔者创作的个人目的,还是有普及《史记》的心愿的,让在两千年前遭受奇耻大辱的司马迁,能在两千年后真正扬眉吐气,让更多的后学能够受益于他的不朽著作,他也应该含笑九泉了。孔子说过: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中有一句话:“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;愚者千虑,必有一得。”还有一句话:“狂夫之言,圣人择焉。”就是说人要不耻下问,哪怕这个人是个一无是处的愚者和狂夫,只要他还有对的地方,我们就要学习,不能因为其缺点,掩盖了其优点,这是两个方面,不能混为一谈。韩愈说:“是故,无贵无贱,无长无少,道之所存,师之所存。”又说:“师不必贤于弟子,弟子不必不如师。”还说:“闻道有先后,术业有专攻,如是而已。”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看问题的角度,不要只重虚名,不重实际,不要以

偏概全,不要因为别人的小过失就抹煞了其优点。大家若是认为笔者有有理的地方,不妨思考借鉴一下,就是有错误和偏颇的地方,大家也尽可批判,这种批判本身就是一次精神的磨砺,对您是有好处的。如果没有分析、判断的思维,就是把刻录着整个图书馆的芯片植入大脑,也毫无用处,因为现实社会是复杂多变的,这些不能使用的死知识是不会给现实提供方法的。

有件事我必须做一下澄清,就是我在此时推出此书,有人又会说这是跟风之作,是跟“百家讲坛”之风,虽然我这样提出有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的嫌疑,但我还是要讲明白。必须承认现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,“百家讲坛”厥功甚伟,这是一件好事,利国利民的好事,我要是也乘了这股东风,我深表感谢,但是在我决定创作,并且进行构思和书写手稿时,我只是隐隐约约听到一点“百家讲坛”的事,根本没有什么深刻印象。“百家讲坛”推出《史记》主讲人王力群先生也是2007年1月份的事,如果说谁能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写出七八十万字,那我只能佩服得五体投地,尽管我年轻,但还是研究了近十年的《史记》,创作此书也用了七八千个高效小时。笔者才疏学浅,至于我的书是不是剪刀加糨糊的胡编滥造,是不是对其他人的剽窃,在创意上是不是嚼人家吃剩的甘蔗渣儿,大谈些陈词滥调,大家看完《史记》原著,并且把王力群先生的书,以及书市上各种各样的关于《史记》的图书进行一次比较,甚至把所有关于解读历史、普及经典的书拿来进行比较分析,应该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。

笔者真心希望拙作不会唐突古圣先贤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。笔者尤其对司马迁钦佩之至,是他让我领悟胯下之辱、卧薪尝胆、破釜沉舟的伟大精神,让我理解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的意义。我们应该继承并且发扬这种精神财富,只有思想才能真正改变人生和民族。对于个人来说,这种财富善莫大焉,多多益善,对于民族来说,弘扬民族文化,匹夫有责。思想的僵化造成了中华民族百年的屈辱史,莫让悲剧重演,因为覆巢之下安有完卵?民族的强大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。我们不要侮辱民族经典,不要“言必称希腊”,先不管这种“希腊”适不适合东方文化,可能您学的“希腊”只是皮毛,会蹦出几个英文单词根本不叫国际化。我这么说不是要大家夜郎自大,我只是说要在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情况下,兼收并蓄,首先我们要研究好自己的“国学”,“国学”就是外国人研究不懂的中国特色的学问。我也不是说我们要在祖先的辉煌上睡大觉,我们不但要提我们民族曾经“过五关斩六将”,我们还要提“败走麦城”,看屈辱史是为了“知耻而后勇”,看祖先的辉煌是为了树立正确的自信。束之高阁的理论是没用的,被教条主义束缚的理论是可怕的,不是我们的文化和理论错了,而是我们没有做好,毛主席说对于中国文化,我们还是小学生。善哉斯言!民族

的兴亡至少以百年为单位,我们中华民族叱咤风云几千年,后来因为自大自狂导致故步自封,因为故步自封导致积贫积弱,因为积贫积弱导致饱受欺凌,可以庆幸的是,因为民族文化有雄厚的积淀,历经百十多年的艰苦奋斗,终于又迎来了这个伟大的复兴时代。大家记住我这句话:我们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一定还会再次击败任何“暴发户”,并且我们中国文化能够打好“持久战”。

因为笔者能力所限,错误之处在所难免,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指正,对您帮助我进步的举动,我只会感激。在一个讲究头衔、注重门阀的时代里,我非常佩服华夏出版社的勇气,不因小子我的鄙陋和无知,给我一次宝贵的机会,如果说在“世无英雄”的情况下,在一点点自信力支撑下,我也是千里马的话,华夏出版社及本书的编辑陈振宇先生无疑就是伯乐,只要有伯乐,千里马随处随时可见。在此,我向任何一个伯乐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在这里,我要感谢我的家人,尤其是我姐夫、姐姐、二嫂,他们让我懂得了爱的含义、勇气和责任,正是这种信任与支持,才让我走过“精神上的万里长征”。我的“管鲍之交”们,让我体味友情的伟大,贫贱之交的可贵,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奇妙意境,尤其是李永哲、李大明、田立军先生对此书的出版贡献良多。甚至是打击我、侮辱我、诽谤我、折磨我、误解我的人,我也一并感谢他们,是他们让我知道忍辱负重的内涵和怨天尤人的悲哀。谢谢那个曾经无知无识、意志薄弱、优柔寡断的自己和与我肝胆相照、荣辱与共、不离不弃、忠贞不贰的“情人”——痛苦,让我体味到精神炼狱的不寒而栗,为了浴血重生,为了摆脱她的痴情,所以我取《史记》的精神内涵之一,并且坚决付诸实践:奋斗。如果说非要我定一个期限的话,那就是:生命不止,奋斗不息!

言不及义。敬请大家指正。

王嗣敏

2007年6月